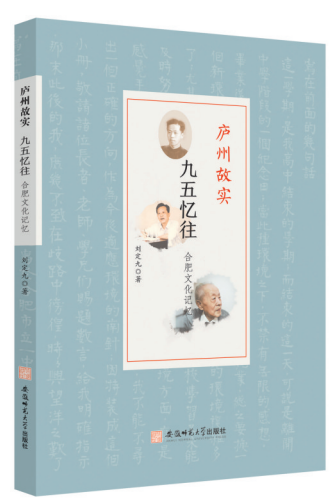


品读

# 茶余酒后说从前

## ——父亲《我居住过的地方》整理后记

刘政屏



大病初愈的父亲才把这份手稿交给了我。

“你不是一直想要吗?”父亲说。接入手稿的那一刻,的确有些小激动:老人家终于交出来,真不容易。第一时间翻看手稿,是那种500字的大稿纸,一共45页,估算了一下,2万多字。可惜的是,老人家只写到第九部分“中山路121号——连接解放(1947年8月~1949年7月)”,而我很想看到的是之后的日子里,父亲和母亲住过的地方,经历过的坎坎坷坷。当然这些回忆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痛苦的,这或许也是父亲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原因吧。

其实父亲是准备写完这个系列的,为此他不但拟好章节名,还在后面密密麻麻地加写了一些关键时间点和关键词。这时候,我才搞清楚父亲母亲结婚的时间是1953年12月,在此之前,我一直以为是1954年1月,因为他们总是告诉我是年末,而我以为是农历年末。

另外,也许是父亲出于某种考虑,有些地方一笔带过,有些地方语焉不详,与人为善、语言谨慎是父亲的一贯态度,在感情上更是克制,而这些是我一向不以为然的,有时甚至会当面提出。父亲即便会微笑地接受,但之后还是依然故我,改变不了。由于是初稿,父亲没有能够对文稿进行反复仔细地打磨修改,以至于会有一些事实上和文字上的小问题存在,对此,在录入过程中,我已尽己所能作了一些修改,为了整体的平衡等,一些发散的思考和论证也予以删除。而我并没有发现的问题或许还有,只能请读者指出和海涵了。

记忆

# 那座荒院,是时光写给出版人的信

张万金

我第三次来到旌德县乡下的这个破旧的小楼前,环顾四周,院墙塌陷得更厉害了,瘦骨伶仃的几根梁柱歪斜在秋光里,犹如古墓里残存的肋骨。近十年来,我三次探访这处孤零零的“吕碧城故居”,每次却皆如新遇——它竟一次比一次更瘦削、更萧瑟了。

第一次来时,院墙尚算完好,尽管木楼门板剥落,窗棂凋零,墙上的“吕碧城故居”字迹还依稀可辨。我伸手抚过,触手冰凉。忽然想到“出版”二字,亦是这般从无到有的刻痕,将无形之思化为可触之文。只是,这般初次的惊诧与触动,终究是轻浮的,如风吹过水面,荡开了波纹却未曾扎入深处。

第二次来时,风雨侵蚀的痕迹更甚了。我恰与几位朋友同行,提及吕碧城,友人面面相觑。我一时无言,只得指着那破败门额:“此宅主人,是中国最早的女出版家。”他们目光游移扫过,终究只留下些不解的敷衍笑容。而我心头却如坠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:新闻出版人倘若不知吕碧城,恰如建筑师不识梁思成、林徽因,是连自己根系都漠然忘却的笑话罢?只得暗自惋惜着,又绕宅子走了几圈。

可今日重来,这残垣断壁,倒使我如面对一面时光之镜。我默然立在院内,抚摸那木柱上的裂纹,如触碰着历史苍老嶙峋的骨节。昔日“出版家”的金字牌匾,在潮湿与虫蛀之下早已化作朽木,其上甚至滋生着绿意森森的苔藓。

我忽而忆起,彼时一个清冷的午后,在一家资料室翻阅早年出版书目,竟发现过吕碧城主持刊印的读物。那书页泛黄,铅字却深凿纸页,仿佛有

不肯枯竭的精神之力,执拗透过岁月向此刻传递着温度。而此时,我站在这破败院落中,脚下是野草疯长的土地,却有种难以言说的愧疚感浮上心头。更深沉的,恰在于我辈出版人自身——我们日日忙碌于新纸新墨,可对于根脉,却连触摸也不屑吗?新时代的出版大厦在喧嚣中节节拔高,地基的砖石却任其在荒草里被蚀空,被遗忘。

遥想吕碧城当年,亦曾以柔韧之心,将铅字与墨香沾上书页,欲为国民启智传薪。如今她的故居却被岁月之手拆成零落的一堆瓦砾,凄惨地横陈于野草荒烟之中,任其无声哭泣。我躬下身,捡起一块带着苔痕的残瓦,握在手中,冰凉而粗粝。这触感直抵心底——所谓“保护”,岂止是梁柱不倾?更在于拂去蒙蔽历史面目上的尘埃,使后来者认出自己精神谱系上那被遗忘的刻痕。

若有一日,这木楼得蒙修缮,不必金碧辉煌,但求还原那纸墨木版的气息。那时,檐下或可展示她印行的书刊,墙上简介其筌路蓝缕;更可以辟出一角,让后来学童知道,此处曾有个女子,在铅与火的时代,以文字作舟,渡人于蒙昧之河——这样的文旅,何尝不是对历史无声的铭记?它远比那些仅知追索古装拍照、品茶尝鲜的浮光掠影,更于无声处深植了文化的骨血。

就在该文收笔之时,旌德朋友传来吕碧城故居正在修缮的照片,恰为文字收尾添了温润注脚。岁月流转,才女风骨与故土文脉,终在修缮的一砖一瓦中,得以延续回响。

时光写给出版人的这封荒院之信,一定会成为我们拂开苔痕的指尖,把岁月藏起的故土,一笔一画,还给山河。

随笔

# 平衡

张建春

约在我五六岁时,冬闲季节,村里来了个杂耍班子,搭台玩“大把戏”,“大把戏”是村子里人对杂技的叫法。“大把戏”节目五花八门,其中有一节目,大叔骑独轮车“走钢丝”。大叔精神,戴顶小丑帽,蹬着独轮车在悬着的钢丝上进退自如,但又歪歪扭扭,让人捏了把冷汗。没想到的是大叔看中了台下的我,停车从台上走下,一把将我架在了他脖子上。我还没来得及惊呼,大叔已驾着我骑上了独轮车。我只顾抱着大叔的头,心“怦怦”跳,生怕掉了下去。大叔左右扭着身子,轻轻对我说:平衡,保持平衡,没事的,没事的。

“保持平衡,没事的”。这应是我最早听到的“平衡”一词,也知道了平衡的重要,平衡了就不至于从“走”钢丝的独轮车上掉下来。

演出结束后,大叔到我家,要义是要“招”我进“杂耍班子”,说我会“平衡”,是能玩“大把戏”的人。我又一次听到了平衡二字,并且平衡还是种本事。我爷爷当即拒绝,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:我孙子去玩“大把戏”平衡,我家就不平衡了。这话我没听懂,但我明白,我爷爷不同意我进“杂耍班子”。看完“大把戏”,我和小伙伴们常玩两个游戏,一是将棍子立在手指头上,二是走独木桥,这都要保持平衡。棍子稳稳立在手指头上,是要棍子保持平衡,走独木桥则要身体保持平衡。

平衡就这般进入了我的幼年生活,也成为人生最早的有意义的启蒙。

我爷爷是个智者,他是个善于做平衡文章的人。记得爷爷带我下地锄棉,总要留下一些诸如灯笼果的植物。爷爷说是留给小生物的,小生物要填肚子,野果吃饱了,就不会祸害棉桃子了。爷爷没说这是动植物间的平衡,但我理会是。当年青黄不接的日子,我们肚子饿,从麦地走过,见有嫩豌豆在麦地招摇,我们就不放过正抽穗的麦子了吗?村子里爱说:大碗小碗都要一碗水端平。能把一碗水端平的人,是要有平衡力的,这平衡力是物理的,也是发自内心的。把一碗水端平不容易。二婶守寡多年,将俩儿子大舜、二舜拉扯大,俩儿子成家了,面临着分家单过日子。二婶家四间正房加个披厦,大舜、二舜一人两间,二婶住披厦,一家分成了三家。似乎很公平的事,但大舜、二舜都说二婶一碗水没端平,手心手背都是肉呢。

二婶找我爷爷评理,我爷爷“一公两不为”,了解了情况,为的是门前的树,两兄弟一家二十棵,却是粗细不均、品种优劣不同,各有各想法。

我爷爷搞明白症结,回家,脸一沉,说:树收回,归你们妈,百年后做老屋。两兄弟竟没了话,默认了。我爷爷叹气:真是大舜、二舜,心平衡了,一碗水也就平了。

心平衡了,一碗水怎么端都是平的。

进入社会几十年,我总是忘不了小时“大把戏”台上的一出,许多时候也是在走钢丝,只是这钢丝往往是无形的。在无形的钢丝上平衡自己,就能将路走稳些。妈快九十岁了,多病身体弱,但笑脸常在,对我说得最多的是“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,知足了”,妈很豁达、平和,她的平衡是用平和来表达的,平和是可以看见的,是物理的,也是心理的。妈一辈子吃了很多苦,年少时妈家是大户人家,我外公是笔杆子。后饱受匪祸、战乱,我妈陷入了贫困之中,反差极大。但我妈找到了心中的平衡——哭着累、笑着累,一样苦,莫如笑着过日子。

我妈找到了心中的平衡,不喊苦不叫累,把手边的事做好。心中平衡,是可以营造积极的生活态度的。我妈一辈子就是如此,心中有佛,笑佛,如一花一世界,一石一佛陀。

前些日子读《心经》,“色不异空,空不异色,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。”色和空是种平衡,平衡的“受想行识”是种大平衡。初冬的暮阳刮进书房,窗前一棵栎,不久前还色彩斑斓,如今已裸枝毕露,余阳镀亮它,展现的是另一种美,这也是种平衡吧?对季节的平衡,对即将的大雪飘飘平衡。